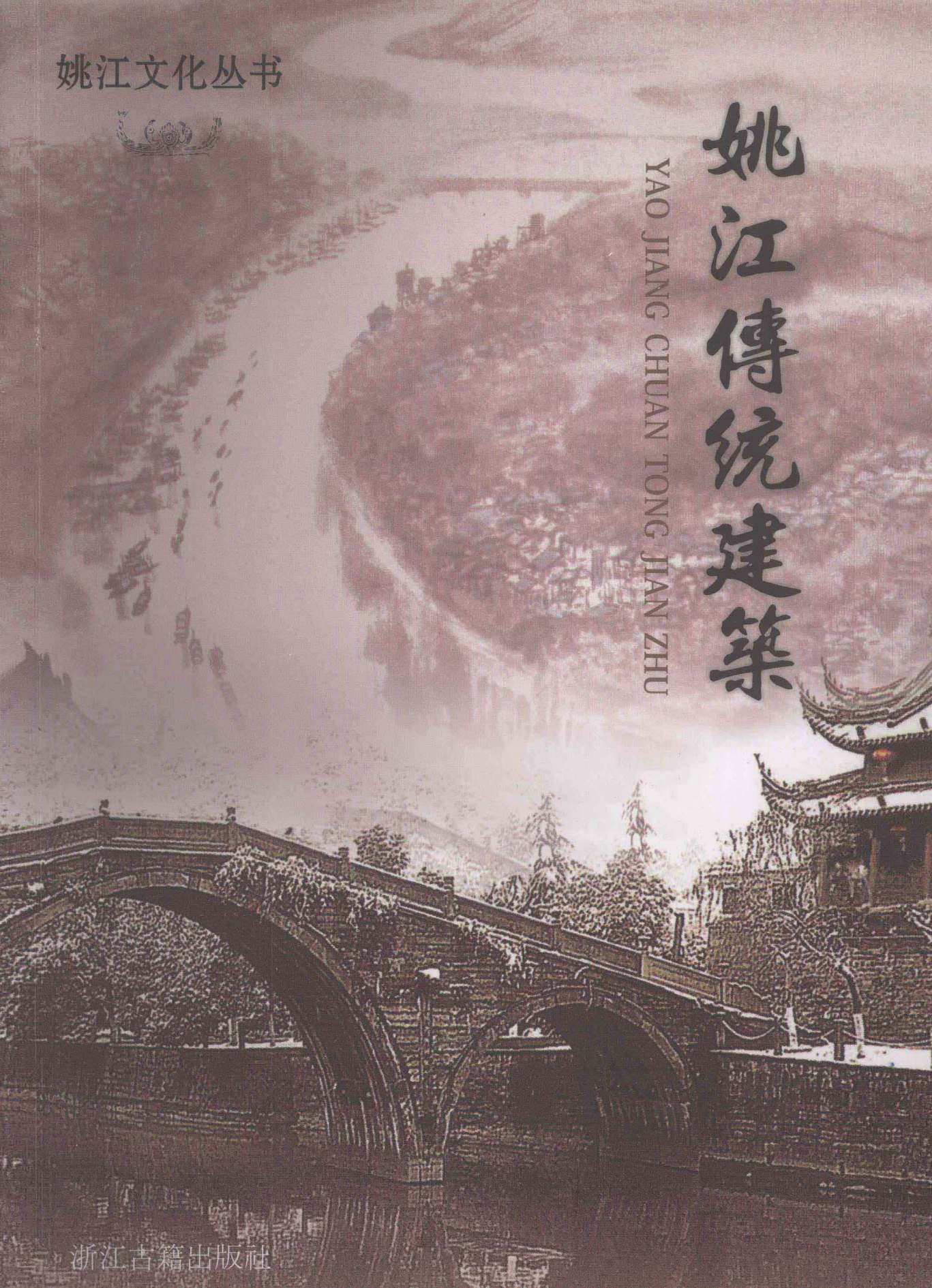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傳統建築

YAO JIANG CHUAN TONG JIAN ZHU



浙江古籍出版社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传统建筑

YAO JIANG CHUAN TONG JIAN ZHU

主编：叶树望 孙栋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江传统建筑 / 叶树望, 孙栋苗主编.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3

(姚江文化丛书)

ISBN 978-7-80715-538-6

I. 姚… II. ①叶… ②孙… III. 古建筑—建筑艺术—余姚市 IV. ①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562 号

姚江传统建筑

叶树望 孙栋苗 主编

-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 责任编辑 朱艳萍 张 姣
- 整体设计 朱艳萍
- 封面设计 计文渊 刘 欣
- 制 版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1092 1/16
- 印 张 21.75
-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80715-538-6
- 定 价 128.00元
- 网 址 www.zjguji.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一）

余秋雨

如果借用中医的经络学说，那么不妨说，中华文化经络的主干，由大河组成。姚江文化则是整个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但是这个问题关涉到广远的背景，请允许我在这篇序里稍稍讲开一点。

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河川文化。从地理意义上，北部的草原、西部的高山都是中华文化的屏障和边极，对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大；东部和南部的大海对中华文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存在，一直没有建立亲和关系。因此，中华文化的中心不是游牧文化、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以河川为命脉的农耕文化。河川灌溉了农业文明，又会不断地破坏农业文明，所以治水成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使命，“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作为一种“原型”永久承传，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做治水的大文章。

中国有四条大江，北端的黑龙江、南端的珠江，遥相呼应，拢括了绝大部分国土；而中间部位则是两大世界级的河川：黄河和长江。其中，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非洲的尼罗河。

中国的早期文明分布很广，但最集中的是黄河流域。不仅远古时代的三大帝王尧、舜、禹都建都在现今山西、河南的黄河边上，而且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咸阳、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商丘等都城，也都紧贴着黄河。

河川哺育了经济和政治，必然也会进而哺育文化。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大部分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等都产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和山西，因此他们所奠定的中国思想的经典模式，也可以说是黄河岸边的思考成果。当然，大智者产生于环境又超越环境，黄河岸边的思考的影响遍及九州大地，与此相应，黄河流域的艺术文化也达到了极高水平，即便是今天的旅游者也能从一座座雄伟

的古代建筑和一处处雕塑、绘画、石窟中领略当年黄河文明的气势。

但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终于从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转移了。转移的直接原因开始与文化无关，但后来却显现出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原因。

转移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黄河的自然灾害，黄河流经北方的黄土高原，每年要挟带十六亿吨黄沙泥土下来，致使下游淤塞决堤，在近两千年中，决堤泛滥已达一千五百多次，平均每四年有三次。这种频繁的危害使黄河流域越来越难成为人民生养安息之地，更不可能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了。

转移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邦国密集、政局更迭，使黄河流域成了征战的热土。每次战乱必然会带来大量民众、士人的南逃，南方本来还属荒蛮之地，却因南逃人群的开发而日益繁荣起来。尤其是公元四世纪初期的“永嘉之乱”，大量北方士庶避难南逃，直到很多年之后诗人李白仍然经常目睹南逃景象，而一见这种景象就联想起永嘉年间，他有诗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转移的第三个直接原因是逃奔的目的地长江流域平安富饶，足可安居。长江也有洪灾，但近两千年间决堤泛滥约两百多次，平均每十年一次，只占黄河水灾的百分之十四，再加上长江流域气候温润，雨水调和，土地肥沃，经济中心的转移有很充分的条件。

因此一般说来，晋代以前，黄河流域强过长江流域很多；由晋至唐，两河对峙；而宋以后，重心已在长江流域，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次文明重心的转移常常伴随着严重的对抗，但奇怪的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没有发生这样的对抗，两河文明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了，这使中华文明避免了一次致命的内部冲突，奇迹般地延续了生命。造成这种良好结果的原因是：

第一，长江文明早有悠远的准备和积累，底蕴深厚，高度发育，因此黄河文明在向长江文明转移的时候，并没有在文明浓度上减弱。源远流长的长江在黄河文化显赫之时，早就默默地濡养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不仅拥有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墨子，而且还拥有不同凡响的屈原和其他为数不少的文化大师，这使得纷纷南逃的士庶百姓不是走向荒昧，而是加入了一种新的文明。

第二，当长江文明悄然崛起的时候，黄河文明的核心精神尤其是儒家精神以

其固有的宽厚和大气与长江文明建立了友好关系,重心转移变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在风格上,黄河文明雄浑、豪迈、粗砺;长江文明瑰丽、清朗、精雅,都与两河的自然风貌有关,又足以互相补益。当然,这除了两河的阔大气象外,还与两河文明同属农耕文明有关。

第三,一些以长江为生命的文学巨匠,以自己的万里行迹、开阔胸怀和精美作品,把长江文明推上了举世瞻仰的高峰地位,使文化即便不仗经济之势也能巍然自立于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有继屈原之后漫游于长江之畔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他们流连江滨,沉醉长江、描写长江,使长江成了一条文化上的大川,足以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第四,与我们这部《姚江文化丛书》有关,从明代开始,长江下游的姚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人文思维的一个重镇,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游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对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经不亚于滔滔黄河了。

任何突起的亮光总有远期的火种,姚江文化在明清两代的突然辉煌不能不让全国学人回过头去追溯地域性的历史原因。这种追溯为长江文明的履历增加了证据,特别是河姆渡文明的发现,更让人们把深长的思绪投向远古。也许,前面所说的重心转移其实只是皮相之见,把政治的集中、记述的丰富、表层的热闹当作了判定文化重心的标准?也许,重心这一概念的设定就是“大一统”观念的产物,中华文化其实一直处于多重心、也即多穴位的状态?但是,在尚未获得更多切切实实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前,我还无法放弃上述的宏观经络图谱。姚江文化,既是这一图谱的产物,又有可能改动这个图谱,这样的研究,太有诱惑力了。

历史终于推进到现代,姚江文化的魅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余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日新月异,人们愈加产生了重新认识和发扬姚江文化的责任感。眼前这套《姚江文化丛书》,是在余姚市政府的主持下各相关单位合力编写的成果。格局完整、资料齐备,充分体现了当代余姚人对姚江文化的一种自觉体认。历代余姚人总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文化自觉广受瞩目,这套丛书又提供了一个当代例证。

总序（二）

王永康

余姚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早已闻名遐迩。自2004年组织上调我来姚工作之后，通过对城乡各地的调查、名胜古迹的探访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进一步加深了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了解，增添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感情。

这里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是风光旖旎的山水城市。放眼余姚，南屏巍巍四明山，北枕滔滔杭州湾，百里姚江横贯平原腹地。而作为全境中心的姚城，则是一水中流、四灵环抱、虹桥飞架、双城相拥的风水宝地。从四明幽谷中的道家洞天、唐诗之路，到杭州湾畔的四季绿原、观潮景点，处处都是引人入胜的佳境。如今，更成为一方旅游观光的绝好去处。

这里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姚江流域沃土遍野，宜于农耕与生活。1973年在姚江之滨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以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了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人工栽培水稻，捕鱼打猎，构建干栏居舍，形成原始村落。余姚因而被中外考古学家确定其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同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继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之后，这里又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之说，当代著名学者史树青教授因而认定余姚为虞舜所出的“姚墟古迹”。

这里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余姚自秦时置县两千余年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两汉之交的高士严子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名臣孙子秀等，皆名垂千秋。明清两代，这里更因孕育了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阳明），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梨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之瑜（舜水）而蜚声海内外，以至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赞叹：“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

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

这里众志成城，英勇抗战，是名扬全国的革命老区。余姚人民爱国爱乡，历来有与入侵外敌、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传统。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姚北群众在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率领下奋起抵抗，终于荡平了倭寇。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辟了以姚南梁弄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包括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四个地区，十四个县域的人民政权，名列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为余姚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这里区位优势，经济繁荣，是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余姚地处浙东宁绍平原中心，东接宁波市区，西临绍兴、杭州，物华天宝，经济发达。沪杭甬铁路、杭甬高速公路和杭甬运河横贯境内，空运、海运近在咫尺，交通十分便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余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齐头并进，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综合实力连年排在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而今，余姚这座千年古城，正以强劲的步伐，朝着经济更具实力、文化更富特色、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趋和谐、人民生活更为殷实、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和谐宜居城市目标迈进。

在沧海桑田的几千年，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余姚人民在农业、水利、工商、文艺、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创造了惊人的业绩，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史记载。继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全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国务院又先后确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王阳明故居、黄宗羲墓和浙东区党委旧址等胜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余姚的光荣和幸运！

为了留存文史资料，记载前贤和今人的创业行迹，使之成为弘扬优秀文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中共余姚市委、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编辑出版这套《姚江文化丛书》。作为建设文化强市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相衔接，争取用四到五年时间，完成全书的编印任务，以期姚江千年文脉绵延不绝，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发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概 论

回顾一种文明发生与演化的历程，离不开考察它的空间形态。对应于人类古代文明四大基本活动的衣、食、住、行，其中“住”和“行”的空间形态就是传统建筑和古道桥梁。在余姚，从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建筑的萌芽起，一直延续到宗法社会末期，期间，不断地积淀、继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以院落为单元，再以纵、横两个方向的轴线上多进、多路的院落，呈现出与其他地区同中有异的地域风格，同时也显示出宗法社会中人伦秩序的排列组合，和对宗法制度的空间性表达。

原始社会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考古实例。河姆渡文化前后经历了约 2000 年时间，这时期，先民的建筑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住宅建筑作干栏式。据河姆渡发掘现场干栏式建筑桩木的总间距推测，建筑进深为 7 米。以每排桩木的长度看，有长达 23 米以上的，如果每间房屋的面宽以 3 米计算，则每幢住宅至少有七至八间房屋，无疑是一种“长屋”。在每排桩木中有数根直径较大，间距相当的大桩木，应是主要的承重桩，其间架设纵横交错的地龙骨。桩木与地龙骨的交接点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大桩木利用丫形树木，地龙骨直接安放在树杈之间，然后进行扎结加固；另一种是采用先进的榫卯技术，通常是在大桩木的上端开凿卯眼与地龙骨的榫头契合，然后在地龙骨之上铺设地板。从木桩露出地面的高度来看，基座高约 1 米。这便形成了架空的居住面。至于屋架的构建，通常认为是在架空的居住面上立柱架梁，构筑屋架，而后敷椽，用苇席和茅茨盖顶。中期是栽柱式地面建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挖洞栽柱，柱子直接埋入，四周填以石子、碎陶片和红烧土块等；另一种是先掏洞，洞底垫以木板（木块），然后再在木板（木块）上立柱，这是后世古建筑中柱础的最初形态。晚期做法则是先掏挖柱洞，柱洞内填

入沙石、陶器碎片、红烧土等，经人工夯实后作为柱子的基础。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自河姆渡文化后期开始，这种曾对我国古代建筑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干栏式建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余姚一带逐渐衰弱下去了，最后被另一种古老的地面房屋建筑所取代^①。凡此种种，说明当时余姚一带的木构建筑技术已明显高于黄河流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为有河姆渡文化那样久远和深厚的木构建筑历史渊源，促进了后期穿斗式结构的出现，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至于两层楼房的形成，才有中国古典建筑木结构技术的辉煌成就。

进入宗法社会特别是东汉至六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后，南方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这时在余姚历史上掀起了第一个建筑高潮。住宅、园林、别墅、城墙等建筑快速发展，还出现了寺院等建筑。早在西汉末年，严子陵就“携其妻孥迁余姚龙泉山之南麓”建屋居住^②。东汉建安五年(200)，吴将朱然为余姚长，于姚江北岸龙泉山以东建城，城围“一里二百五十步，高一丈，厚倍之”^③。城内道路采取正东正北走向，作十字形相交，并与四门相通。城墙用夯土筑成，非常坚固。当时城内城外建筑成片。据《余姚县志》记载，当时的主要建筑有“汉蜀郡太守黄昌宅在治西南一里，黄桥之南。桥本昌创建”。即现在的大黄桥。黄昌“本出孤微，居近学宫”^④。“虞国宅在绪山（龙泉山）南……今为百官仓。”“养亲堂：晋右卫将军虞潭以太夫人年高，求解职东归，起堂养母，亲友会集作诗言志。”可见，当时的住宅建筑已有了会友论文的中堂。不仅如此，有些豪族还建有小桥流水的园林，力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的自然意境。如贺墅，内有聚石引泉，植林开涧的贺溪，为太傅贺循居住游玩之处。虞国墅，是汉虞国的别墅，园内石路崎岖，堆山掘池。阮家池，是在治西南梁文宣太后令嬴故宅，建有曲沼、飞梁、重阁。其他还建有一些馆、亭等建筑。同时，由于佛教的传入，加上统治阶级的提倡，兴建佛寺逐渐成为当时余姚的重要建筑活动之一，并对以后这一地区的建筑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如建于余姚龙泉山南麓的龙泉寺，东晋初建时规模就比较大，以后又不断扩建。

东汉至六朝的地面建筑已不见实例，而余姚古代墓葬出土的明器陶屋、人

① 参阅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01、202页。

② 光绪《姚江云柯严氏房谱》卷一《家史引》。

③ 光绪《余姚县志》卷三《城池》。

④ 《后汉书》卷一七〇《黄昌传》。

物楼阁罐和零星文献记载,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建筑形态,包括单体、院落等。当时的余姚民居平面为方形、长方形或日字形。屋门开在房屋一面的当中,或偏在一旁。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数采用木构架结构,其木构架技术已日渐完善,抬梁式和穿斗式都已发展成熟。多层楼阁已大量增加。早期墙壁用夯土筑造,后期用条砖砌叠。屋顶已使用筒瓦或瓦当,多采用悬山式顶、庑殿顶、攒尖顶和歇山顶。有的住宅规模较大,无论平面是一字形或日字形,都以墙垣构成院落,后者有前后两个院落,中间一排房屋较高大,正中有楼阁高凸,其余房屋均较低矮,衬托中间的主要部分,使整个组群呈现出有主有从、富于变化的外观轮廓^①,显示出建筑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物质性要求的同时,特别重视血缘亲性关系和宗法伦理思想。据考古发现推测,当时建筑的地下排水设施已比较完备。如马渚湖山的南朝墓,不但在基底设有砖砌排水阴沟,而且在墓室前部还砌有窰井,上覆砖制阴阱盖。马渚湖山的东汉墓,在紧靠封门砖的外侧设置陶质排水瓦筒,残长6米有余,内径16厘米,瓦筒之间用子母口紧密套合,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时地下排水功能的完备和先进^②。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最初是茁壮、粗犷,尚带稚气,到后期,已呈现雄浑而带巧丽、刚健而带柔和的倾向,这是余姚一带建筑风格在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发展阶段,显现出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色和社会进步。

明清以前的余姚古代民居,仅见于一些考古资料和点滴文献记载,已无实物可觅。比较完整的民居实例都是明清以来的遗存,其中清代遗留下来的较多。明代建筑虽已不多见,但毕竟仍有实例可见,使我们能对这一时期的民居建筑有较多的了解。

明清余姚民居完全是在特定地域下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延续发展过来的,虽受封建等级制的影响,但却疏于约束,较政治中心地区的民居更加依存环境,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因而在与环境生态融为一体的有机生长中,保留了纯朴的古风和浓郁的地方性。其平面造型、内部装修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东一带的自然条件和时代文化意识。那些历代朝廷制定的建筑法规性质的文

① 季学源等主编:《姚江文化史》,宁波出版社1998年版67页。

② 叶树望主编:《姚江田野考古》《余姚市湖山乡汉——南朝墓葬发掘报告》2008年版312、321、322页。

件，如宋代的《营造法式》与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对当时政治中心地区建筑经验的总结，习惯称为“官式手法”。余姚一带的建筑匠师们根据自己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一套建筑经验，往往是师徒相传，口授身教。这些经验总结，只是技术规定，不能以法令强制执行，只能是匠师们自愿遵守执行的，习惯称之为“地方手法”。但在余姚明清建筑工程的实践中，许多实例都证明两种手法往往互相混用。以余姚一地而言，就存在城区、平原及山区的不同居住风俗和建筑风格。

明清时期，余姚名人辈出，官僚地主麇集，他们或世居故土或辞官还乡，都曾先后营建了颇具地方特色的深宅大院。这些宅第大多分布于平原地区，尤以城区的宅第最为典型，均反映了其时代建筑风格和技艺水平，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余姚的宅第建筑一般都是坐北朝南的封闭式院落，总体布局是纵向轴对称，两边的厢屋也完全对称。单体建筑一般是五间二弄或三间二弄，多者可达十三间。纵向少者三进，多者五进，最大进深可近百米。它们一般是：沿着纵轴线自南往北，分别为照壁、门厅、前厅、后堂、楼屋，最末一般为堆放杂物的低矮的后罩屋。大门呈八字形，开在门厅明间，每进单体建筑之间均有庭院分隔。两侧或有厢房，或直接围以砖墙。庭院中常砌有南北走向的两道砖墙，把庭院一分为三，纵轴线上形成川弄式，整个布局井然有序。这种传统格局，大多为明代建筑，以城区郭家道地、宰辅第、翰林房等最为典型。其中宰辅第尚存门厅和正厅。门厅明间脊檩枋上置组合斗拱，大门原由头门、二门和三门组成。头门宽大、厚实，门槛也特别高。门厅前的石阶左右原有一对高两米多的石狮，雌雄相对，威势逼人。正厅高大空阔。各厅间前的天井，均用大石板铺设，中间设甬道，两侧置厢房，临天井一侧有回廊相通。天井北首尚存石制门楼一座，古朴典雅，眉额上明代彩绘仍隐约可见。再如翰林房，全宅通面阔近40米，通进深达92米，两侧厢楼从南至北紧密毗联，各达18间，临天井一侧设回廊相通。梁架结构用材横断面呈圆形，瓜柱肥矮，下部做成鹰嘴状。各间中柱或脊瓜柱上置座斗承十字拱支撑蝴蝶木及脊檩。整个建筑群结构朴素，用材较大。

城区的叶家举人房，在总体布局上略有不同。共三进，一般在每进建筑的明间北首，均建有砖石结构的门楼，勒脚做成须弥座，上立石柱，石柱上压有石天盘。眉额上的砖面雕有精致的花纹，并有砖雕斗拱、檩及椽。门楼两翼的围墙与庭院两侧的厢屋南山墙连接，并在每进建筑左右有贯通前后的备弄，从而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纵深排列的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院落。类似这种地区性格局的建

筑还有王阳明故居、黄家墙门等，大多是明末清初的。

另外，还有少数形同北方的四合院住宅。大门开在纵轴线偏东，即整座住宅的东南角上，门内迎面建照壁，使外人看不到宅内的活动。自此转西为前院，南侧为倒座，自前院经纵轴线上的二门，才进入全宅的核心部分。采用这种布局的大都为清代建筑。如武胜门路的倪家民居、陆埠的翁家老宅等。

从总体布局上看，余姚的明清深宅大院还有跨院式布局。即除了向纵深增加院落外，还从横向发展增加平行的几组纵轴，如城区的霍宅和丈亭的九进十明堂。

余姚的明代建筑梁架结构的组合比较朴素，新颖多变，气势宏伟。明间用抬梁式木构架，其他各间采用穿斗式与抬梁式的混合结构，有时为了使厅堂明间与次间组合更大，还采用减柱造，即省减去前金柱或后金柱。这种结构一般是通过延长抬梁以搁置童柱来替代金柱的功能，以达到简洁、明快、开阔的目的。例如谭家岭的朱家大厅等。明代建筑梁架结构的外围砌空斗墙，分隔墙仍残留有竹笆泥灰壁。屋顶多为悬山、硬山或风火山墙，也有卷棚顶。楼屋一般为重檐，厅堂明间均施六扇六抹扇，棂子做成六角、八角、方格等几何形，或干脆用板窗和板门。同时，还考虑到气候和季节变化等因素，保持室内外空间互相连通，避免太阳直晒，防雨，因此，房屋进深特大，出檐也深，并设置外廊。大多数厅堂门面和分隔堂屋的平板门可拆卸，作敞口厅和扩大明间空间。在楼房的分层处还设有腰檐，没有腰檐的山墙窗门多加雨披或窗罩，便于雨天开启。围墙、风火山墙的上部一般也都盖有瓦顶，以保护墙面不受雨水渗透。厅堂前多有卷棚顶廊子，形制秀美而富于变化。梁架的装饰或素面或仅加少数雕刻，涂栗、褐、灰等色，基本不施彩绘。房屋外部的木结构部分用褐、黑等色，与白墙、煤线、灰瓦相合，色调雅素明净。

明代或明末清初建筑中的梁枋用材一般比较粗壮，梁的横断面呈圆形，枋的断面显得瘦高，瓜柱矮胖，呈柁墩状，有的下部做成细长的鹰嘴状。柱子呈圆形。檐柱及中柱上经常置大斗及十字斗拱，檐下多无平身科、额枋或穿插枋，但个别的在脊檩枋上置有平身科。如宰辅第大厅明间脊檩枋上置四攒一斗三升斗拱，次间置三攒。斗拱在明代民居中的应用已有较固定模式，基本上已失去了承重支撑功能，而仅仅是作为宅第规格、等级的标志，这对以后的清代民居斗拱仅起装饰作用产生很大影响。柱础有鼓形，素覆盆式，毡帽形及上为鼓形、下呈覆莲状的双层柱础等四种形式。地面均用方砖直铺、菱形或错缝铺墁。门厅左右两侧分

隔墙均用水磨方砖菱形贴砌。明代建筑的总体结构可以说是规矩谨严,用材粗壮,结构简练。尤其是王阳明故居及邬家道地的大厅,气势之高大,气魄之宏伟,在余姚是屈指可数的。

明代有严格的住宅制度,严禁在宅第的前后左右构筑亭馆、开池塘、建花园。但此规定似乎并没有阻止余姚人在宅第外的区域建筑园林。据地方文献记载,在余姚城区先后建有乐志园、光禄园和众乐园。其中乐志园就在宰辅第右侧,规模也最大,为吕本过继孙子吕祠部所建,俗称落马园。园背倚龙山,三面环水,园中红渠绿篱,山池萦绕,岛山俯瞰,清雅幽静,远隔尘世^①。

余姚的清代建筑,普遍用材不大,比较注意装饰。例如丈亭九进十明堂,为清代早期建筑,纵向三进,由多条轴线及备弄组成,规模很大,整个布局不拘一格。它们的特征是:较多运用勾连搭牵梁架结构,瓜柱瘦高,下部也呈鹰嘴状,有的做成荷叶墩式;轩廊月梁一般刻有花纹;柱子呈圆形,有的采用“包镶法”;柱础呈鼓形或显得瘦高的毡帽形。到了清晚期,结构有些过于繁琐,木雕、石雕、砖雕精美,廊顶的“轩”,跨度小,制作精美、繁复,轩梁、花篮及雀替上均布满雕刻。斗拱的比例相对缩小,平身科一般置于金檩枋上,仅起装饰作用。在有些建筑中还出现了雕刻精制的斗拱,给人一种雕镂琐细、繁缛柔靡之感。较典型的有工人路的宜春堂、低塘双桂楼及河姆渡万隆老屋。

余姚山区的民居,已不见明代建筑,大多为清中后期的建筑遗存。这些建筑由于受地形、环境及经济条件的限制,总体布局大多因地制宜,依山势傍溪而建。一般以狭窄的天井为中心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式为主,不向纵深或横向发展,一宅一院,占地不大,位于山岙。为适应山地特点,房屋择向不限朝南,东、西亦可。前为门厅,正中为堂屋,是宴客行礼之所,两侧或楼上为长辈住室,两厢为晚辈住所或厨仓之类。四周为排洪沟,遍植竹木,处境隐蔽。其特点是灵活自由,经济便利。

由于山区比较阴雾潮湿,因此,山区建筑与平原封闭禁锢的民居结构形式相比,显得比较敞开外露,给人以舒展轻巧的感触。天井和堂屋,常以鹅卵石及石板满铺。建筑梁架以穿斗式为主,所用木料直径较小,通常为就地取材的杉木。抬梁构架一般为三架梁,跨度较小。建筑木材常以熟桐油涂刷,木纹天然。室内分隔墙多用“竹笆抹泥灰”粉白,外墙为不规则块石砌叠,也有土坯墙和少量砖墙,与青灰瓦相衬,形成了色彩、肌理、质感的自然对比,温润明朗,与山野绿

^① 叶树望主编:《昔日姚城》,天马图书出版社2001年版80页。

色相映生辉。富庶之家，则在不大的建筑空间内漆以黑、褐、棕色调。梁枋、雀替、撑拱及槁扇门、窗的绦环板和裙板上精雕细饰人物故事、神仙、八吉祥等图案。格心棂条形式多样，纹饰繁复，呈现出小巧玲珑的建筑风格。如雁湖何胜黄宅，规模虽不大，但装饰雅致，雕刻精美、豪华，犹如一座巧丽的“雕花楼”。

余姚的山区民居大多依山势而建，在地形坡度稍缓时，房屋内部空间则顺斜坡而建，即全室可处同一倾斜面上。如钱库岭张宅，其门厅依山势建在斜坡上，形成前立面高于背立面的建筑形式。在门厅内的过道上置18级如意石阶。如在地形稍陡处建房，则修筑阶台形地基，房屋分幢跌落或抬升，使前进和后进分处在高低不同的台基上。如棠溪唐家墙门，穿过门厅过道，即为十级石阶，拾级而上，才为主楼前的石库门。

总之，余姚的深宅大院，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和成熟的尺度与空间安排：宅第严格区别内外，尊卑有序，讲究对称，对外隔绝，对内自有天地，与长江下游一带的宅第建筑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其自身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东一带的古代民居风貌。

余姚的山区建筑由于受地形的制约，特别重视空间的合理利用，总体布局依据现场的地形情况而定，设计思想近于“功能主义”。同时，由于山区居民礼制思想相对于平原地区为淡薄，因此，在追求建筑造型完美的同时，充分展现出灵活的组合和形式多样的民居格局。

宗庙在民间称“祠堂”、“家庙”，先秦自天子、诸侯至士大夫阶层以下均有宗庙或家庙。汉代臣民家庙均称“祠”，一般建于墓侧。两晋时的家庙为宅邸内的“客堂”、“庙堂”等。直至隋唐至宋，祠堂才真正成为维系宗法血缘纽带的核心，反映出宗法秩序和空间布局的天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朱熹在《家礼》中谈到祠堂时说：“君子将营宫室（指住宅），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制三间或一间”，建在宅内，属家庙性质，可见其规模仍然很小。到了明代，朝廷方“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可以全族共建，至此才出现了全族共有的祠堂建筑，规模也相应扩大了。

余姚现存的祠堂建筑都建于清代。由于各宗族大小不一，经济实力不同，因此，宗祠建筑有的简陋狭小、有的壮观宏大、装饰豪华，还附建有义仓和戏台，成为地方上突出的建筑。如泗门谢氏始祖祠堂，前后共有三进建筑，占地面

积 1638 平方米。前厅议事、后厅享堂，主楼为后寝，两侧各置五开间义仓。全祠规整宏大，气势庄重，装修精湛，彩绘生动。但不论祠堂建筑规模大小，其最基本的格局都是由享堂、后寝和两翼附房组成，序列完整，布局规整对称。建筑风格大体同于宅第建筑的前堂、后寝，但建筑形制却隆重得多。一般来说，享堂是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是全祠的中心；后寝或为平屋或为楼房，是供奉祖宗牌位和庋藏族中珍宝家谱和诗书文墨的处所。这些祠堂，都客观地反映了余姚历史上的祖宗崇拜和封建宗法伦理制度。

佛教大约在汉代就已自印度经西域传到中国。当时佛寺已有以殿堂为主和以佛塔为主的两种布局形式了。汉魏以来，由于皇帝的敕建以及南北朝时民间“舍宅为寺”的时尚，促使佛寺进一步汉化为中国固有的宫院或宅院布局，并包含了不少中国宅第建筑的因素——同样都以木结构为本位，都采用院落形式的群体组合。

余姚最早的寺院是建于东晋咸康二年（336）的龙泉寺，唐咸通二年（861）毁后敕建，以后又逐渐扩建。至元代，已“自山麓至绝顶，殿阁俨然，背山面水，为一邑佳处”。现存大雄宝殿及藏经楼为清光绪元年（1875）重建。余姚现存的古代佛寺都为清代建筑，其建筑群布局虽同于宅第的院落形式，但建筑的规格和规模要明显高于宅第建筑，特别是大雄宝殿，一般多为歇山顶的宫殿式建筑。即使为其他小式建筑形式，也均建得高大恢弘，装修精美。如始建于五代时期的禅悦寺，后又敕建于后晋天福元年（936）。现存建筑为清光绪三年（1877）重建，其虽为小式建筑，但重檐马头山墙、高台基的大雄宝殿，精湛的卷棚、梁枋雕刻，瑰丽的壁上彩绘，仍然显现出当年雄伟、典雅、肃穆的风格。综观余姚古代的佛寺建筑，一般以纵轴线对称布局，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及两侧配殿、藏经楼等，规模普遍不大。其显著的特点是，不见寺院有钟鼓楼和佛塔，至今更无实例可寻，也无文献记载。这种现象在余姚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这可能与儒学对余姚社会历来的深刻影响，促使人们能较理性地对待宗教有关。通过对佛寺规模的简缩，表现出不注重表现人们心中对宗教本身的狂热，而是重在“再现”彼岸世界的宁静和平安的实用宗教理念。

对自然的敬畏、对先贤圣哲的崇敬和追慕，历来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被神化后，就出现了始于汉代的祭祀建筑——庙宇。

余姚现存的庙宇均为清代建筑，一般规模较小，从其地域分布来看，一者建于集镇和城区，多官方所建，采用传统的纵轴对称方式布置院落，较严谨整饬；

一者建于远隔闹市的深山僻地，多为民间自建，密切结合所在环境的自然景色和地形起伏，采用当地民居手法，风格活泼灵巧，气氛质朴亲切，追求一种超脱尘世的境界。如从庙宇的性质分，也可列为两类：一类是略同于现代的人物纪念馆，属广义祖先崇拜范畴，其泛家族的色彩具有更多的人文文化内涵。如牟山的关帝殿、河姆渡的金吾庙等。另一类所祀的是民间信仰的各类神灵，有一定的宗教性，可称为准宗教建筑。如城区梁堰村祭祀“东岳”的岳殿、鹿亭仙圣庙等。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的仙圣庙的戏台藻井和大殿斗栱，是余姚传统拱昂建筑的杰出代表。其戏台藻井，由精致的斗栱和翘昂组成，层层出挑，盘旋而上，内收成穹隆顶。藻井四周还雕塑八个龙头和花篮，结构繁复，装饰考究。大殿额枋上的平身科斗栱，双昂，出五踩，是余姚现存传统木构房屋建筑中栱昂出挑最多的一例。

在余姚传统庙宇中还有一种与民俗活动有更多关联，多由同业商民集资合建的奉祀各行祖师的建筑，略同于现代的同业商会，较典型的为山王庙。山王庙在大隐集镇内，初建于唐代，重建于清代，是一处具有浓厚商业特色和民间风情的祭祀建筑群。大隐历史上采石业非常发达，居民大多以采石为生，随着采石和石材贸易的不断发展，才逐步形成了大隐集镇。因此，山王庙作为当地石业祀祖庙宇主祀山石神秀公，并配祀财神和鲁班。庙内殿堂不但“三雕”精细、繁缛，挑廊卷棚精湛，马头山墙高耸，而且还建有一排临街商铺楼面，作为石业者们议事、经营之场所。可见此类庙宇性质颇为驳杂，既祭自然神，也有祖业崇拜的意味，又有道教的成分，更是行业经营的处所。业内人士好像并不太在意这些区分，只要有一个祭祀、聚会和洽谈生意的场所就可以了。

总体而言，这些建造在集镇和乡村山林胜境中的敕建或民间寺庙的建筑特点，可归结为天人相宜、空间多变与民居格调、地方风格。

桥梁是江南水乡的道路纽带，也是水乡的特色。在余姚境内众多的石桥梁中，以在墩台之间用拱形构件承重的石拱桥为最多。它以独特的风格和美丽的造型，赢得了世界桥梁史上的盛名。据考古资料，这种桥型在我国至迟始建于东汉时期。拱桥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据余姚一带考古发掘显示，东汉时期的墓室顶部已开始出现砖拱式结构，但拱券形式还比较粗糙，尚无楔形砖出现，券顶显得单薄，凹凸不平，结构不甚牢固，可以看出当时的起券技术尚处于滥觞阶段。到了两晋时期，墓葬结构前设甬道、后建墓室，顶部多用楔形砖和阴阳榫形砖砌